

文以载俗：《牡丹亭》成语德译中的中国古代世俗文化形象建构

沈雨馨，付天海

大连外国语学院德语学院，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2026年5月28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1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13日

摘 要

本研究以德国汉学家洪涛生(Vincenz Hundhausen)翻译的《牡丹亭》为研究对象，从“形象学”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其对剧中汉语成语的翻译如何建构了中国古代“世俗文化”的“他者形象”。文章首先将剧中的184个成语依据功能与内涵分为人物形象、空间描写、社会伦理、哲理典故四类。随后，通过分析每一类别中代表性成语的翻译策略，论文考察了译者在传达原文情感内核与适应德语读者接受习惯之间的平衡。研究发现，洪涛生的翻译有选择地弱化了中国特有的制度性、礼制性文化符号，而强化了以家庭伦理、自然情感和人生哲理为核心的普适性文化元素，最终在德语世界中塑造了一个重亲情、讲礼教、贴近自然且富有生活智慧的中国古代世俗文化形象。论文进一步从一战后德国的“中国热”这一译入语背景和译者本人的诗人身份与翻译观两个方面，探析了此种文化形象重构的动因。

关键词

《牡丹亭》，中国古代世俗文化，汉语成语，汉德翻译，形象学

Literature Embodies the Secular: The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Secular Cultural Image in the German Translation of Idioms from *The Peony Pavilion*

Yuxin Shen, Tianhai Fu

School of German Studies,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Liaoning

Received: May 28, 2026; accepted: July 1, 2026; published: July 13,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German sinologist Vincenz Hundhausen's translation of *The Peony Pavilion* as its research object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ology, investigates how hi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idioms in the play constructs the "image of the Other" of ancient China's "secular culture". The article first classifies the 184 idioms in the play into four categories based on function and connotation: character portrayal, spatial description, social ethics, and philosophical allusions. Subsequently, by analyzing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representative idioms in each category, the study examines the translator's balancing act between conveying the emotional core of the source text and accommodating the reception habits of German reader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Hundhausen's translation selectively downplays institution- and ritual-specific cultural symbols unique to China, while reinforcing universal cultural elements centered on family ethics, natural emotions, and life philosophy. Ultimately, it shapes in the German-speaking world an image of ancient Chinese secular culture that values family bonds, respects ritual norms, is close to nature, and is imbued with practical wisdom. The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motivations for this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mages from two aspects: the "China fever" in post-WWI Germany as the target-language context, and the translator's own identity as a poet and his views on translation.

Keywords

The Peony Pavilion, Ancient Chinese Secular Culture, Chinese Idioms, Chinese-German Translation, Imagolo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牡丹亭》是汤显祖“临川四梦”的巅峰之作,以杜丽娘与柳梦梅跨越生死的爱情为主线,融合梦境现实与生死轮回,突破儒家礼教对情感与女性的约束。中国古代世俗文化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关注现实生活、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牡丹亭》中的闺塾、园林、情爱、信仰、礼俗、诗词等及其呈现的宗教大众化、儒释道社会化,都具有强烈的世俗色彩。该戏剧语言融汇六朝骈丽辞采与元曲本色,以“俚俗俳优之语”将闺阁风雅与人情本原婉转曲达,受到俞平伯“幽微灵秀,姚冶空濛,自成一家,独有千古”的盛赞[1]。作为一部雅俗相融、集各家大成之作,剧中化用诸多经典成语,又自出机杼凝练出新创成语。其欧洲首部德语全译本 *Die Rückkehr der Seele* 由德国汉学家洪涛生所译,将这一浸润着晚明世俗文化的东方经典完整引入德语读者的视野,其中对成语的处理参与了中国古代世俗文化“他者形象”的塑造。

2. 形象学与翻译研究

形象学为《牡丹亭》的翻译研究提供新的阐释空间。它所探究的是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与描述[2],聚焦文化符号运用、象征意义再现以及“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的互动关系。而形象本质是主体基于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文化差异所进行的选择性感知与建构[3],这就要求译者深耕《牡丹亭》的创作文化背景,了解塑造对象。此外,在翻译场域中“他者形象”的建构直观体现了译者

结合目标文化的文化适配, 其建构效果影响着目标语读者对源语文化的接受与认知[4]。洪涛生对《牡丹亭》的翻译, 为中国古代世俗文化这一异质文化在德语文化语境中实现重构搭建了桥梁, 其翻译策略的选择改变了成语的呈现方式与文化样貌, 以形象学为分析工具探究其中世俗文化的“他者形象”再生, 能为古典戏剧跨文化译介的文化形象传递提供参照。

3. 《牡丹亭》中的成语与中国古代世俗文化

汉语成语是“人民群众长期沿袭使用的, 结构基本固定的短语或短句。”[5], 其语义植根于丰富的文化语境和历史典故, 凝聚着中华民族特有的认知。《牡丹亭》中的成语广泛分布于曲词与宾白, 既服务于人物刻画、情节推进与意境营造, 又为戏剧语言的韵律节奏增添雅致与张力。本文所涉成语的认定, 以收录于《汉语成语大词典》为主要依据, 不限于四字格形式, 凡三字、五字、六字、七字乃至短句、复句形式的固定语, 只要符合成语的定型性与习用性特征, 均纳入考察范围。

成语作为语言的精华, 是世俗文化的集中反映。所谓“世俗文化”, 是一种以现实为核心的文化形态, 其包容性促使着文艺作品在题材和风格上趋向世俗化、平民化。中国古代世俗文化以现实人生、现实人间为本质, 关注此岸世界, 具有血缘家族、勤劳节俭、务实理性等核心特征。血缘家族为社会基本单元, 依托孝亲伦理、宗族治理维系秩序; 勤劳节俭是生存之道, 务实理性贯穿生产生活, 二者均植根自然经济与农耕文明, 表现为顺应农时、经世致用与中庸处事; 科举制则为民众提供上行发展空间, 成为现实生活中积极动力[6]。《牡丹亭》创作于明代中后期, 彼时阳明心学冲击传统礼教, 肯定人欲的世俗化新思潮涌动, 汤显祖将世俗文化深度融入作品[7], 而承载世俗文化的成语在德译中经译者重构, 成为建构中国古代世俗文化“他者形象”的重要切入点。

4. 各类成语德译中的中国古代世俗文化形象建构

经过对《牡丹亭》全本的逐出细读与人工统计, 共摘取成语 184 条, 并依据其在剧中的实际功能与文化承载特点, 划分为人物形象、空间描写、社会伦理、哲理典故四类, 数量分布见图 1, 以下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成语作具体分析, 梳理洪涛生的翻译策略选择及其对世俗文化形象的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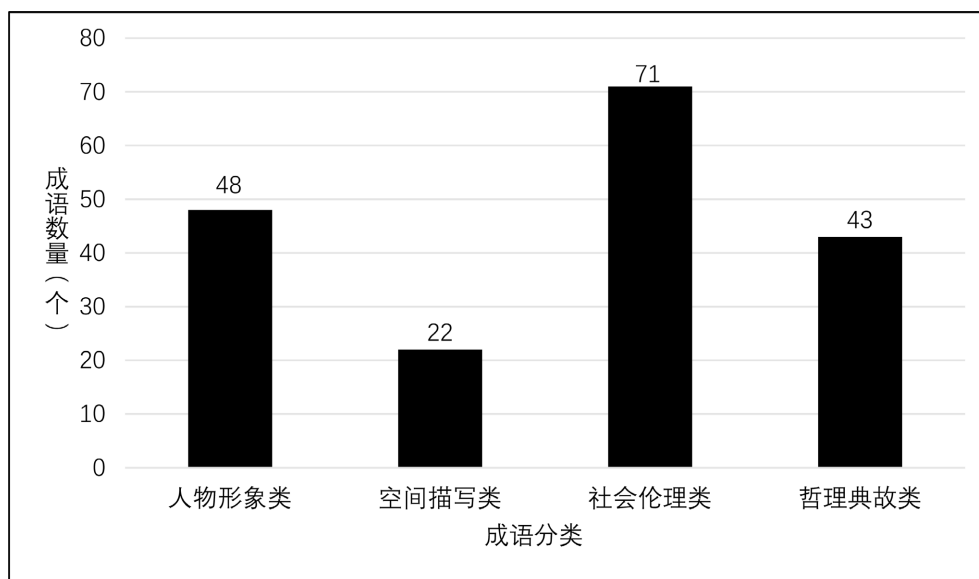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Chinese Idioms in *The Peony Pavilion*
图 1. 《牡丹亭》各类成语数量统计图

4.1. 人物形象类

戏剧通过成语刻画人物的身份、容貌、品性与内心, 在杜丽娘梦回庭院、哀怨自省以及柳梦梅贫寒落魄、怀才不遇等情节中强化艺术感染力, 树立明代士人阶层与闺阁女性的典型形象。如“掌上明珠”译为“gleich der Perle in der Hand bewahrt”, 译文保留“珍珠(Perle)”这一珍贵意象, 使杜丽娘作为家族珍宝的形象得以确立, 重现了以家庭为中心、重视子女价值的伦理形象, 使读者感知到中国古代家庭中亲情纽带的紧密性。“蒲柳之姿”是杜丽娘拜师时面对老师表明自身体质弱的自谦之辞。译为“hilflos wie ein schwaches Rohr”, 以芦苇(Rohr)替代蒲柳来传递柔弱之意, 使德语读者结合上下文得以感知到中国传统女性自我谦抑的礼仪规范, 从侧面也反映出尊师重道、长幼有序的人伦秩序。“举目无亲”的译文“wenn er die Augen geöffnet hätte, hätte er keinen Verwandten erblickt”通过睁开眼睛(die Augen geöffnet hätte)、见不到亲人(keinen Verwandten erblickt hätte)的表述, 完整保留视觉动作与结果逻辑, 折射出中国古代社会对血缘家族的深度依赖。“饱学名儒”译为“ist von Bücherweisheit übervoll”(充满书本知识)将翻译重点放在前两个字上, 淡化了文人身份内涵而强调学识积累。

此类成语以意译、改译为主, 译者多提炼人物核心特质, 弱化或替换文化专属意象, 成功建构了中国古代以血缘亲情为本位的人伦形象体现为对子女的珍视、女性的谦抑以及亲情的支撑, 但对礼制性符号与社会身份的体现则有所削弱, 淡化制度色彩。这些成语的翻译处理, 使人物的血肉与情感在跨文化语境中得以保存, 也勾勒出一个重亲情、讲礼教的世俗社会人物图谱。

4.2. 空间描写类

此类成语以意象组合营造氛围, 多与中国园林、山水、四时气象及文人书斋相关, 实现情景交融的美学效果。如“姹紫嫣红”与“断井颓垣”的对比, 暗喻杜丽娘被禁锢的青春, 前者译为“Verschwendend beut Er violetten Ernst und rotes Feuer”, 将成语中色彩具象化并赋予情绪为“紫色的凝重”(violetten Ernst)与“红色的炽烈”(rotes Feuer), 实现情与景的融合; 后者译为“Zerfallenen Brunnen, berstendem Gemäuer”, “Zerfallenen”形容倾塌、破败, “berstendem”表示开裂, 以两个分词修饰传递破败感。译文通过“Feuer”与“Gemäuer”的词尾押韵再现了原文对仗的形式美, 传情达意地刻画了中国古代文人审美情趣与自然相协调的世俗生活形象。“文房四宝”根据语境分别译作“die vier Kostbarkeiten des Schreibtisches”及“Kostbares Malgerät”, 均以“kostbar”(珍贵的)及其名词化形式点明其贵重价值, 前者借“书桌”(Schreibtisch)点明其日常文化功用, 后者以“绘画工具”(Malgerät)聚焦其艺术创作用途, 共同勾勒出文人雅致的书斋生活图景。

这些描写蕴含古代文人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创造, 亦刻画日常生活图景。译者往往通过保留自然意象与情境描写, 使其在目标语中仍具有鲜明的画面感。同时, 对于具有文化专属性的表达, 则通过意译或语境化表达进行转换, 使其能够被读者理解。译文既呈现出中国传统生活与自然环境相互交融的特点, 也展示了文人所特有的审美情趣。因此, 在德语读者眼中, 中国古代社会表现为一个富有生活气息与自然诗意的文化空间。这种兼具日常生活与审美情调的形象, 使中国古代世俗生活呈现出温和、细腻而富于情感色彩的文化形象。

4.3. 社会伦理类

该类成语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礼教秩序与价值体系, 广泛涵盖婚姻制度、家庭关系、性别规范、社会等级和法律意识等多个层面。明代社会以儒家伦理为社会运行规范, 强调孝道、父权结构与家族延续。[8]如“年已及笄”蕴含女性成长阶段与婚姻观念, 译文“Schon trage ich das hochgesteckte Haar der Frauen”抓住核心特征并增译“妇人”(Frauen)来传达成年之意并暗示婚恋年龄, 使传

统礼教观念在德语语境中易于理解,但因省略“笄”这一具体符号,礼教细节趋于泛化。“重生父母”以父母生育之恩比喻恩情之重,植根于中国孝道文化,译文“*mir eine Wohltat erwiesen, so groß wie meine Eltern durch die Wohltat meiner Geburt.*”保留“父母”(Eltern)核心意象,通过“堪比”(so groß wie)这一类比结构强调恩情重量,使其伦理意义在德语语境中清晰可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被拆分直译为“*die Einwilligung des Vaters und der Mutter*”(父母的许可)与“*die Sprache des Vermittlers*”(媒人的话),通过并列结构呈现父母与媒人在婚姻中的主导角色,成功重构了中国世俗社会中个人婚姻从属于家族决策的人伦秩序。译文在保留亲属关系与家庭责任等核心意义的同时,对部分文化符号进行了适度调整,传统婚姻观念、父母权威以及子女孝道等文化观念能够以较为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由此,读者得以感知中国古代社会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以及浓厚的亲情伦理氛围。从形象学角度看,其翻译成功展现了中国社会以家族为中心、情感与责任并存的伦理形象。

此外,《牡丹亭》中渗透着对科举制的反思,即便科举制在晚明时代已弊窦丛生[9],仍是中国古代跨越阶层的最重要途径,柳梦梅实现从“寒儒薄相”到“一举成名”便是例证。《牡丹亭》中存在诸多与士人、科举及阶层相关的表达,如“九棘三槐”代指高官权位,意译为“*den neun Ehrenplätzen*”(九个荣誉席位)直接传达高官权位的阶层含义,丧失使中国古代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内涵。在剧中指科举考生进入考场应试的“英雄入彀”被改译为“*Alle Pfeile sind verschossen, und der Wettstreit ist geschlossen*”,停留于表层隐喻“箭矢”(Pfeile)和“角逐”(Wettstreit),剥离了科举取士制度的阶层内涵。“风檐寸晷”指科举考生在恶劣考场环境中争分夺秒应试,“*Ah, in so kurzer Zeit! Ehe der Schatten des Dachvorsprungs einen Zoll weitergerückt ist*”虽以“如此短促的时间”(so kurzer Zeit)传递出时间的紧迫,却未能体现“风檐”特指的科举考场这一内涵,仅泛化为普通的“屋檐”(Dachvorsprung),同样使科举场景在翻译中流失。在该类成语的翻译过程中,洪涛生并未着力再现制度背景,而是侧重表现人物社会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差异。通过语义简化或概念泛化,译文将部分制度化的文化符号转化为读者更易理解的社会身份从而弱化制度细节,却也保留了部分阶层差异与社会竞争的核心意义。这种处理方式间接呈现了等级分明的中国古代社会,又传达出士人追求功名与社会地位的现实愿望。

4.4. 哲理典故类

哲理典故类成语承载丰富的历史典故与文化象征,部分成语契合人物心境而传达命运无常、时光流逝的感悟,反映了世俗社会对因果、际遇的理解。世俗文化强调“此岸”世界,主导宗教而非被宗教主导,包罗了儒家的伦理观、道家的道法自然与生命哲学,以及佛教的禅悟与生死轮回观的多元思想。“天有不测之风云”植根于中国农耕文明对天象的参照,译文“*O, der Himmel sendet unvorhergesehen Regen und Wolken*”用自然意象“雨和云”(Regen und Wolken),以“未预见的”(unvorhergesehen)紧扣世事难料之旨,“*sendet*”(送)一词赋予“天”人格化色彩,映射出孔子“主宰之天”的天命观;“南柯一梦”舍弃典故义直译为“*daß alles nur ein Traum gewesen war*”(原来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场梦罢了),以“*gewesen war*”的过去完成时态巧妙立足于事后回溯这场“梦”(Traum)的视角,传达人生如梦的宿命感;“有备无患”译为“*Wer keinen Vorrat hat, davon zu spenden, Steht in der Zeit der Not mit leeren Händen*”,从“没有储备”(keinen Vorrat hat)的反面切入,灵活呈现积极有为的处世原则。“悬梁刺股”亦与科举制度相关,译文“*ihr Haar banden sie an die Decke, und Dornen steckten sie in ihren Stuhlsitz, um nicht einzuschlafen*”以“天花板”(die Decke)替代“梁”,适配中德建筑结构差异,“刺股”在后半句译为“椅面插刺”,虽使具体意象发生偏移,却保留了勤学苦读的精神内核,呈现了士人为追求功名付出的艰辛。“魑魅魍魉”的译文由四个德语名词并列构成,“*Bergdämonen*”(山妖)对应山中妖魔“魑”,“*Wassergeister*”(水怪)对应水中精怪“魍魉”,而德国民间传说中的家宅精灵“*Kobolde*”与善恶不定的夜间精灵“*Lemuren*”

共同呼应表示的百物成精的精灵“魅”，译者以欧洲神话体系中的形象替代中国传统的鬼怪，降低读者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理解难度。

此类成语文化专属度高，是漏译、错译的集中区域，洪涛生在翻译中往往高度归化，忽略具体典故，通过诗性表达与语义概括的方式传递这些哲理内涵。译文为德语读者呈现出中国古代敬畏天命、务实处世的世俗信仰与积极入世的态度，使他们不仅能够理解人物的情感与命运，也能够感知到中国文化中兼具理性与超然的生活智慧。

5. 洪涛生成语德译中的世俗文化形象重构动因

洪涛生通过《牡丹亭》成语德译所建构的中国古代世俗文化形象，主要围绕人伦、阶层、世俗生活、处世原则等维度展开，植根于时代背景与译者主体选择的共同作用。

从译入背景来看，该译本的翻译与发表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与精神危机，催生了德国第二次“中国热”，“德国出现了一种对远东或东方文明的兴趣”[10]。在此背景下，中国经典与文学作品被大量译入德，四大汉学中心相继建立，德国汉学逐渐转向以文化交流为核心的专业化发展，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普通德国民众。[11]这一转变为《牡丹亭》这类承载世俗文化的经典戏剧译介提供了重要契机与成熟的接受土壤，也使译本建构的中国古代世俗文化形象契合德国民众对世外桃源般的东方国家的期待。洪涛生对这部“东方莎士比亚”剧作的翻译，引领德国人“真正接近了中国伟大的文学”并“首次理解了中国文化”。[12]但这场热潮并非建立在平等、客观的跨文化认知之上。彼时西方世界有着一套的价值判断体系，将中国古代科举、礼教等传统政治制度视作落后的东方遗存思想，译文或为满足德语受众对“诗意东方”的想象，规避文本中流露出的对封建制度弊端的反思，这一文化信息的流失可能引发德语读者对中国世俗文化这一核心维度的认知变形。

从译者主体来看，洪涛生的成语翻译取向与其整体翻译观高度一致：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文的可理解性为优先，注重传达成语在具体语境中的功能与意义。他深知源语的语言形式与修辞难以在德语中词对词再现，故而倾向于“与其词对词翻译，不如意义对意义翻译”[10]，同时作为诗人，他渴望剧作家那份创作的自由与诗才，渴望着中国戏剧中的美与抒情性[13]，因此他有意识地再现戏剧中的音韵、重复、对偶等艺术手法[14]，正如季羡林对其的评价：“他是一个天生的诗人。所以，他的译文同原文多少都有出入；但他写成的诗却是完整的文艺作品。”[15]他在处理成语时同样以语境功能与意义传达为重，力求保留原作的美学和特色，并贴合德语的审美习惯。正因译者注重实现美学目标，导致译文不可避免的丧失部分准确性，存在误译和漏译的现象。此外，译者翻译策略中部亦隐含着文化权力维度。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东方”并非自然的存在，是人创造出来的，[16]中国文化形象是西方在真实与想象之间所建构的知识和权力关系。洪涛生虽无明确的政治意图，且其翻译工作是在中国合作者完成初步的字面转译的基础之上，结合德语诗性特征创作而成，过滤科举制度、礼教压迫等内容的翻译行为在哪一步骤完成无从考证，但从该译本在德语地区广受好评的传播和搬演这一结果上来看，译文的归化译法也参与了一种“文化东方主义”实践，使中国古代世俗文化呈现为去冲突化、去制度化的理想形象，消解了《牡丹亭》原著中对晚明社会弊端的讽刺锋芒。

6. 结语

《牡丹亭》作为中国古典戏剧的瑰宝，其译介伴随着古代中国文化形象的传递。洪涛生对《牡丹亭》中成语的翻译在尊重戏剧文本特征的前提下，省略部分制度背景与文化意象，重现了一个以家族伦理为纽带、以自然节律为依托、融合儒释道处世智慧的世俗中国形象。该译本将戏剧中的家庭、政治、梦境、亡灵、幽冥世界、爱情与野心生动地呈现给德语读者[17]，较为完整地传递出中国古代世俗社会的

人伦、阶层、世俗生活与处世原则, 其翻译思想和形象再现模式对我国古典戏剧的翻译与传播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万云骏. 赞俞平伯《牡丹亭赞》[J]. 戏剧艺术, 1990(3):105-107.
- [2] 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
- [3] 王运鸿. 形象学与翻译研究[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8, 41(4): 86-93.
- [4] 张艺琼. 网络武侠小说《盘龙》英译中的中国文化形象构建[J]. 文化学刊, 2025(8): 191-194.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135.
- [6] 吴忠民. 世俗化与中国的现代化[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83.
- [7] Chen, Y.P. (2018) Tension and Flow: An Analysis on the Emotional Structure of the Peony Pavilion.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232**, 361-365.
- [8] 陈支平. 明代家族社会转型及其观念变迁[J]. 中国社会科学, 2024(2): 172-187+208.
- [9] 伏涛. 从《牡丹亭》看汤显祖的科举情仇[J]. 戏剧文学, 2014(11): 104-109.
- [10] 毕鲁直, 林施望.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古典诗词与戏曲的文学翻译——以洪涛生为例[J]. 国际汉学, 2020(1): 66-76.
- [11] 金蕊. 德国汉学的变迁与汉学家群体的更替——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为中心[D]: [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 武汉大学, 2016.
- [12] Chen, Q. (1933) Die chinesische schöne Literatur im Deutschen Schrifttum. J.J. Augustin.
- [13] 周童. 洪涛生中国古典戏曲翻译研究——以《牡丹亭》的德文译本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宁波: 宁波大学, 2023.
- [14] 汤显祖. 牡丹亭 汉德对照[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6: 1420.
- [15] 季羨林.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61.
- [16] 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4-7.
- [17] 刘颖, 姜琦. 场域理论视角下《牡丹亭》的德语译介与传播研究[J]. 大连大学学报, 2025, 46(3): 32-36.